



## 烟灰,从指间洒落

□ 孙小地

或许是年岁大了,父亲更加重视起自身的健康,已步入古稀之年的父亲突然决定戒烟了,而且居然成功了。那股呛人的烟味没了,因烟熏而剧烈的咳嗽声没了,家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我看到父亲那不再染着烟黄的食指和中指时,不知怎的,内心深处却涌上一股莫名的异样的失落感,像游丝,悄无声息,却又是那么的鲜明。

由于打小看父亲抽烟,因此对父亲抽烟时的一举一动都熟识万分,拆烟盒,点烟,夹烟,敲烟灰,弹烟灰,摁烟蒂……每一招每一势都传达着父亲的喜怒哀乐。

父亲是家人的骄傲,他博学多才,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因此退休的他虽身处乡野,却也常有与之相仿人士前来家中海聊。来了,坐罢,上茶,大概是为了省去递烟的诸多客套环节吧,烟总是整着包在显眼处放置着。随着一口浓茶润过嗓子后,话题便如画卷般铺展开来。一开始,往往做一些闲聊“热身操”,什么天文地理,南来北往,奇闻逸事,瞎扯一番,完了便自然扯到了国家大事这个正题上。谈到兴奋处,父亲便会习惯性地燃上一根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好像这根烟能催生他的思辨能力,随着烟雾的升腾,父亲的分贝也随之升高,很有一种“烟高一尺,“声”高一丈的豪情。聊味越来越

浓,争辩的火药味也越来越烈,父亲抽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终于对方败下阵来,这时父亲又惬意地燃上一根烟,像是给自己的奖赏,更像是收工后的一种体力滋补。

夜深人静时,父亲喜欢独自坐在书房里看书、思索。这时,他又会用食指和中指夹上一根点燃着的烟,手肘抵着桌面,燃着的烟就被举到了耳根处悬着,可父亲并不抽它,就这么纯粹的燃着,烟雾袅袅,似梦境似仙境。烟灰越来越长,但并没有往下掉的意愿,因为父亲压根儿没有动一动手。终于烟灰撑不住,重重地跌落下来,感觉很生气。烟灰里的几颗火星子也召回了父亲的魂魄。父亲从书中,从思索中回过神来,瞅着快燃尽的烟,惋惜地笑或摇头或举杯喝茶,然后象征性地猛抽一口,再用指尖狠狠弹弹烟灰,好像是对自己浪费的惩罚。

熟悉着父亲那种敲敲弹弹的处理烟灰方式,有时,还学父亲的这些动作,搞笑一把。却不曾想到过自己还会被父亲的这些动作感动着。

我出嫁那天,全家上下喜气洋洋,到处都盛开着笑脸,每个角落都洋溢着笑声。如果没有摄像,如果没有那个细心的摄像师,如果我在后来没有认真地翻看这盘录像带,也许我一直都不会知道,其实,那天,在这样

一个欢庆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平时看起来乐观豁达似乎还对我显得漠不关心的父亲,竟然独自一人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伤心。录像带里,父亲蹲着身子在抽着烟,依然是食指和中指夹着烟,依然是将烟举至耳根处,烟雾依然在父亲的头顶袅袅,然而,然而不同的是,父亲,我的父亲的嘴角却在噙着,父亲的眼角泛着红,父亲的鼻翼张翕着,父亲的食指和中指在颤抖。看着录像带里的这一幕,泪水已像决堤的洪水肆意地在脸颊流淌,无声但厚实的父爱感动着自己幸福着自己。

烟灰,从父亲指间洒落的一幕永远锁定在录像带里,也永远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样的一幕后来我又有幸亲眼目睹,那是一次当父亲得知我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重病时,我发现在大家都凑在一块担忧的时候,已显得有些苍老的父亲却独自一人蹲在屋子的一角,我清楚而真切地看见:我的父亲,我儿子的外公此刻又夹上了烟,伤痛但饱含着爱意的烟灰再次从我父亲的指间洒落。

父亲戒烟了,意味着从今以后他不再抽烟了,意味着他的食指和中指不再夹烟了,意味着烟灰不再从他的指间洒落下来了。这怎能不让我产生一种失落感呢?

## 多才多艺的父亲

□ 何南荣

父亲初中毕业,放在现在根本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很有文化了,他尤其擅长珠算,打算盘很是流利,能一边打算盘一边写字。

1955年永昌、永桥、何云三个村合并成了永高级社,当时农村条件还很落后,温饱都成问题,先进超前一点的乡村,自力更生,用机械化取代人工磨面粉、碾米等;永昌最早时有一台木炭机是给粮站碾米机提供动力用的,据说每年加工三四十万斤粮食,这些当时的高科技设备就是由我父亲和何福潮、王荣财、何春根四位电工元老在维护操作管理。

1961年,三村分开后,何云大队章玉腾书记思想超前,敢于标新立异,新购进一台崭新的柴油机,在当时,这可是全永昌公社唯一的宝贝,我父亲和何荣荣(何双福父亲)负责保养维修和操作管理,确保它正常带动碾米、磨面、农用水泵。之前抗旱纯粹用木制水车,靠人力轮班水车,因此这台柴油机显得十分的珍贵和重要,我父亲等人任劳任怨,吃住基本都在机房,对它像保护自己的小孩一样珍爱!

1969年,何云大队兴办富阳县第一家村办企业——何云造纸厂,我父亲也是主要骨干之一!尤其在何云造纸厂升级转型关键期,在章玉腾书记的带领下,父亲和大队长鲍金满、木工技师王春洪等前辈,更是没日没夜,呕心沥血,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在1972年4月15日,最终喜获圆满成功!为此,当年的富阳县商业局还专门下文通报表彰,何云造纸厂的抗边纸技改开创了村级企

业的发展创新,号召全县各级企业向何云造纸厂学习。从此,何云村办企业进入了全县的先进行列。

我父亲业余尤其喜欢声乐和越剧。1954年,在村委支持下,家父偕同何雷源、周章金、蒋炳奎等这些世代务农,从未接触过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泥腿子,白手起家,凭着一腔热血,个个自学成才,创建了何云越剧团。

他们在筹办期间困难重重,缺少演出的戏服和相应设备、启动资金、专业知识及相关人才等等;他们知难而进,群策群力,克服重重困难。

其间,值得一提的是:有次父亲和剧团编剧兼导演何雷源去上海越剧院请教,当时新登的老乡——上海越剧院艺术大师徐玉兰对家乡农村剧团的创建也大为赞赏和支持,并从专业方面给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当时演《白蛇传》的戏服,也是徐玉兰大师赠送的。他们不负众望,走上正常轨道的何云剧团后来闻名周边县市,并经常受邀去各地演出,可谓是一红极一时!

我父亲是大锣师傅,还会拉二胡、弹三弦,同时因为懂电,还包揽了剧团用电相关的全部工作。为了让演出剧情更具有真实感和感染力,他三番五次地到杭州话剧团取经,在戏剧烟火、布景各方面上刻苦研究,大胆创新,因而何云剧团演出的灯光效果和背景设计远远领先于各兄弟剧团。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是永昌公社的第一代电工,与其他几位电工前辈何福潮、王荣财等组成了农村电工小分队,从成

立起就一直负责永昌公社全部的电力安装和维护。

我记得母亲跟我讲了一段当年的“趣事”:因为老百姓当时对“电”这个东西还是很陌生又很好奇的,人民政府也渴望把电力尽早普及到农村各大队,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那时候,公社在每个大队都有选择性地安装了一只广播,早晚广播一响后,附近的社员都会好奇地搬来小板凳坐在广播底下,看稀奇听声音,社员们好生疑问:奇怪,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像人一样会讲话能唱歌?每个人的内心都多了个“十万个为什么”。有人甚至还对着广播喊话,想和它聊天……父亲有时偶尔也向大家讲解广播的原理,于是在在场的社员都说我父亲了不起,竟然懂得这个新奇的知识。

“大跃进”年代,在当时的永昌钱家茶厂,父亲与何福潮、王荣财等人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组建起了一个小型发电站,专门供应永昌、永桥的照明用电。在当时那个贫穷的乡村,小型电站的发电已是特大新闻了。受此影响,我父亲在当时也小有名气,有不少的单位想请他去工作,并给予培养深造的机会,但父亲出于对自己家乡的感情,对团队的责任,一直扎根于乡村电工事业,放弃了旁人认为的美好前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父亲虽然没有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他平凡的一生也不会被刻凿在哪块碑石上,但许多当地乡村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他,还会说起他。我想,这就足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

## 父亲的那片茶山

□ 范建桥

自六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何故犯了数次小中风,幸好医治及时,生活上还能自理,不过每天需要吃几种药。虽然身体表面看起来还算硬朗,但已大不如前,医生也嘱咐他体力不要消耗过大,否则容易复发。所以自那以后,我多次说起过不要管斩高岭那片茶山了,免得父亲太劳累。

我每年都是“五一”假期去割茬,今年已是第五年了。所以假期一般也不安排出去,为的是好好休养恢复。那几日,我身着当兵时穿过的迷彩服,头戴草帽,背着二十来斤的割茬机具,俨然成了一名“新”的老茶农。我左手把持割茬高度,右手控制开关,稳住机杆,还要来回挑一挑割断的茶枝,一时半会也不觉得有多少累,可几个小时都是这样的姿势干活,对我这个不经常干农活的人来说,结果可想而知,而且还要干几天。

待机器需加油暂停时,我迫不及待地走到小径旁,卸掉机具,瘫坐歇息,身上早已汗流浹背,迷彩服已泛出了米白色的汗渍,两个肩膀被生生勒出了两条红里

带乌的醒目印痕,酸胀还带着一丝丝的火辣痛感,加上机具长时间节奏性的同频振动,背肌连腹,口干舌燥,肚子欲呕还饿,晕乎乎的感觉,双手也控制不住地在抖动,手指还时时抽搐僵硬,已经拿不住东西了,连水瓶盖都拧不开。幸有贤妻在旁,递巾送水剥香蕉,我休息好一会儿才能慢慢缓过来。可这是我一年中觉得最累的几天,一下子瘦了四五斤,之后也没胃口吃饭,算是成功减肥。可以想象,看似非常简单的割茬,父亲七十多岁时还在做,那有多么的不易。

说起那片茶山,父亲确实有许多的不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生产队在分配斩高岭上的茶山时,为了公平起见,地处荒僻的浅湾低坡那片茶山面积要大一些,当然这还要看谁能抓阄得到。其实村里人谁都不想要那片茶山,因为去那片茶山干活,路远、坡陡、担重,多一份辛苦是明摆的事实。不知父亲是“幸运”还是无奈,最后是抓阄分得了那片茶山。说是茶山,那也只是刚种了两三年的小茶丛,也没多少茶叶可摘,茶垄间还是种油菜、番薯为主。那些年里,我不知道要跑多少趟茶山干农活。

我入伍时,父亲才四十多岁。渐渐的,他通过调换、开垦、再种植,茶山面积扩大了许多,竟然有一亩多,在当时村里算是最大的一片茶山了。平时,父亲除了在造纸厂上班外,很多时间和精力都在打理那片茶山。

每年清明前后的一个多月,正是茶叶季,除了母亲采摘茶叶,父亲凭一手我爷爷传授的炒旗枪技艺,赚些茶叶钱来补贴家用,有

时外村的茶农也请父亲去炒制。后来,旗枪茶叶被龙井所替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年过五十的父亲又重新拜师学习炒制龙井。虽说有炒旗枪的基础,但毕竟年龄大了,学艺全凭一股子韧劲,不过也算掌握了“抖、搭、撮、捺、甩、抓、推、扣、压、磨”等手法,能像模像样炒制出龙井茶的形状来。可是,每年炒制时手上的水泡是一个接一个,有一个挑一个,直到结成厚厚硬硬的黑茧为止,还要经常熬夜,手工炒茶的艰辛是肉眼可感啊!待谷雨,父亲还要人工去剪茬,一个人需要十来天才能完成。后来,炒茶机和割茬设备一出现,妻子立马就让我买了,父亲也是村里第一个用上这些设备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虽然父亲的茶山属于老品种,但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培育,如今已长得翠绿茂密,茶叶的采摘时间也总比别人的早十来天,原生态无污染且喝得放心的品质,老茶客们是认可的。现在,站在斩高岭的垄岗上,望着掩映在青绿如黛的林间那一垄垄的茶丛,闻着随风吹来的阵阵浓郁的茶叶清香,感觉那里已不再荒僻,而是“人寰之绝境,神仙亦向往”的幽静胜地了。

岁月总是那么无情!不知不觉,我从入伍时的青涩少年变成了临近退休的秃顶大叔,父亲也已八十有一的老人了。这些年,他已力不从心,总是担心我会放弃那片茶山。当看到我割好了茬,收好机具时,父亲原本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露出了旁人不易察觉的愉悦。

## 我的父亲陈全成

□ 陈利群

每逢七月半,我们田畝里几乎家家都做酒酿馒头。七月初就洗晒好大蒸笼和大荷叶,初七初八蒸糯米做酒酿。酒酿发酵至可以搅拌面粉的度数,发酵着的大面团何时搓揉成馒头胚子,蒸笼里的馒头胚子何时大火蒸至成型;这三道工序,有一道稍失分寸,馒头要么塌陷,要么硬如石头,怎么也拿不出手送人。

七月半前两天,父亲总被人邀请去定夺酒酿的成色和威力。同村的外婆来了:“全成,全成!你帮我看看。”外婆亲戚朋友多,一个七月半,总要送出几百个馒头。邻居们过来了:“陈老师,陈老师!你去帮我看看,好蒸了没有。”父亲就这样乐此不疲地跑这家,进那家,断酒力,定上笼时间和火候。七月半的田畝里比正月里还要热闹,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手拎肩挑的全是白白胖胖的馒头,这里面有不少父亲的功劳。

寒冬腊月,年关将近,村里人都要踏制冻米糖。当年不像现在,街头巷尾,总能遇见冻米糖摊子。早些年,父亲踏制冻水塘也时常失败,但渐渐地,冻米糖、小米糖、番芋丝糖都制作的赛过商店买的。父亲成了村里制作冻米糖的高手。常常顶着寒风,腋下夹着案板刀具,东家进,西家出。我们也心疼父亲过于忙碌,过于辛苦,让父亲别再答应人家了。“我们造新房子,哪户人家没有帮过我们?”常遭父亲这样的反驳,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十二月廿几里,屋前屋后干干净净,厨房堂前各式桌椅也透光铮亮了。挂年画,贴对联,就提到日程上来了:邻居拿了红纸上门让父亲写对联,我打下手。父亲不是什么书法家,但在农村乡下父亲的那几个墨笔大字也透着几分道劲。平常帮着在柜子竹篮等各种家什上题个名,标个日期那就更寻常了。

一年四季,一家人要吃的青菜萝卜、豇豆茄子、小麦蕃芋大都靠父亲种植护养。日常生活小事纷繁而又琐碎,样样拿得起也非易事。祖父母在我未出生前就已过世。各种生存繁杂诸事的拿捏与掌控,全仗父亲的用心与责任。自己成家过日子后,才渐渐明白个中的艰难与不易,由衷地敬佩父亲的能力与担当。

无法探究祖父母替父亲取名为“全成”的初衷,但父亲这一辈子的确印证了“人如其名”的说法。记忆中的父亲总是终日忙碌,患肺病的三年里才放下很多。领导同事、村里村外有口皆碑。父亲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他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 抠门的老爹

□ 紫苜蓿

父亲祖上贫困,一直到我出生,依然是一贫如洗食不果腹。儿时留下的印象,就是每到广播喇叭响了,我妈手拿淘米笊箕四处借米的情景。家中五个孩子七张口,加上母亲常年体弱多病,就算大哥二哥自小辍学干活,家里的生活依然很艰难。直到熬到种田自由,再也不用担无米之炊后,我那从未上过学,却敢于改变命运的爹,动起了如何发财致富的念头。

从小务农的阿爹对经商是不懂的,但他身强力壮,倒腾田地有的是力气。智商加力量都在线的阿爹,在生产队时,当了好几年生产小队长。虽然没上过学,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读过夜书扫过盲,大部分字还是认识的。特别是那个珠算,打得是一个出神入化。以至于我家后来卖甘蔗、卖西瓜,无论几斤几两,卖几毛几分,父亲在称出斤两的同时,价格也同步报给了客人,分文不差,把我惊愕得一脸懵。客人会怀疑,然后在那边掐指算,完了一脸佩服。我问父亲怎么会算的,父亲说:“只要你脑子里放着一把算盘,再复杂也会很快算出来。”

我崇拜父亲不只是珠算,更在于父亲口中那源源不断的各种故事。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梁祝、岳飞、小白菜……哎哟,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三国跟水浒,里面那么多的人物啊,他却可以如数家珍,不但记得各路大神的大名,更清楚各自的绰号。以至于后来他经常因病住院,他的病房一定是最热闹的。我去探病,护士跟病友总会说:“你爸爸昨晚讲故事又讲到了被催睡。”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他说都是小时候听书或者看戏文听来的。阿爹这记忆力也不一般啊!

父亲的棋艺也是一绝。村子里几无对手,而且我哥哥们也是个棋艺精湛。甚至我那自小被药喝坏的哑巴二哥,一般人也不是他对手;早年金桥乡撤乡改街道,搞了一次象棋大赛。我爹鏖战三天,与冠军失之交臂,得了亚军。奖励了一整套运动鞋服,还有几百块奖金。回来那天爹穿着这套运动装,那个精神劲啊!应该是这辈子阿爹穿得最帅的一次。这套衣服爹一直舍不得穿,那是荣誉的象征,他特别珍惜。

阿爹种的甘蔗那真的是又粗又长又甜,在附近几个村是出了名的。从一个生嫩小白到高超的种植技术,质的飞跃靠的是不停的经验累积。后来很多人来家里取经,父亲都是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阿爹也种西瓜,种蔬菜。看大街上人们喜欢喝冷饮,跑去杭州买了个冷饮机,纯白糖配我们村的山泉水,比镇上卖的又便宜又好喝,生意很火爆,直到320国道重修为止。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一生勤耕于农,永远相信土地里能耕耘出金子。他不但在自家地里动脑筋,还去租最早受惠的城郊农户土地,利用几个同样勤劳的儿子的劳动力,在田地这个大舞台大展拳脚,算是较早实现手头有余钱的一拨。但阿爹最大缺点就是抠。也许是从前太苦了,养成了抠抠搜搜的习惯。哪怕后面的日子越来越好,古稀之后跟城里人一样有失地养老金好领,他依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一分想存二分的顽固派。就算我苦口婆心说再多,也改变不了他那抠门节约的生活习惯。晚年时我实在看不下去,质问他都这个年纪了,你还要存钱干吗,他滚动着浑浊的双眼,嘿嘿道:“以后我过了,这钱可以留给你们五兄妹平分。”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谁都不会在意你这点钱,留着干吗啊!”我悲愤却又无奈。对于父亲来说,见存折上的数字节节攀升,远比吃香喝辣的快乐。我只能尽自己所能,经常的买点好吃的给他们。为这个抠,母亲也是跟他吵了一辈子。但有一点,父亲很爱母亲,那么抠的一个人,从第一次身上有余钱,马上带母亲去杭州大厦门买了套全毛呢西装这件事上,可以窥见他的爱有多深,只是从不会表达。尽管夫妻俩吵了一生世,但当父亲走后仅百日,母亲也跟着去了。

又是人间四月天,微风携着细雨,拂过脸颊,吹湿了发梢,淋湿了衣衫。恍惚中我又听到了父亲甘蔗地里的催促,“手头加把劲,剩下最后一轮了”。